

与会嘉宾认为——

全球经济将温和复苏

本报记者 李春霞

次预测都在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全球议程理事会全球经济失衡专题小组理事李稻葵则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不仅劳动力参与度处于历史低位,正在进行的中期选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欧洲央行日前宣布将从10月份开始进行类似于量化宽松的政策,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和欧元区非金融企业发行的欧元债券。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路易斯·阿尔伯特·莫雷诺表示,当前欧洲仍然在艰难的挣扎过程中,而且比今年年初的情况还要糟糕。欧洲最疲弱的经济体需要进一步推动结构性改革。

对日本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依旧是摆脱通货紧缩,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表示,要确保名义GDP增长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扩张性轨道,也就是说坚持增长性的政策;同时要实现供需之间的平衡,只有供给充足才能降低价格,并提升供应链的生产率,继而提升利润率,使经济出现积极的增长周期。

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富有挑战的环境当中,过去的两个增长引擎如出口与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渐淡出,而新的增长引擎正在逐渐到位,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在减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首先是基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其次是私人消费正在逐渐复苏;三是中国经

济的绿色化,包括钢铁、石化、电力行业、发电业,这些行业都需要巨额投资来提升生产能力。

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市埋隐患

展望2015年全球经济走势,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基本面持续稳固,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持续增强,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非常规货币政策转轨造成的冲击成为与会嘉宾最大的关注。

肯尼斯·罗格夫认为,美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必将走到加息临界点,但市场尚未对此作好准备。当前美联储对加息时间点的预测与市场预期存在显著差距。照此下去,收紧银根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朱民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美国与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如果美联储与市场间能够进行良好沟通,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美国经济与全球增长都将是一个正向效应;反之,一旦沟通不畅,导致美联储退出时机与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同时发生,并与其他结构性问题产生共振效应的话,将对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全世界需要围绕这个关键问题开展合作。

与会嘉宾还认为,长期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将超过量化宽松退出。

肯尼斯·罗格夫认为,量化宽松本身的影响并不一定能够产生提高利息的影响,资产价格以及相关数据信息警示我

们,低利息持续时间过长会给金融系统带来系统性冲击。

各经济体需作好应对准备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量化宽松退出以及加息预期的不确定性,各主要经济体需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应对危机。

朱民认为,新兴经济体必须为未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转轨作好准备,要确保自身的利率、汇率符合市场需要,同时保证财政赤字在合理区间,通过经济改革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李稻葵表示,一旦美联储整合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对利率产生影响,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路易斯·阿尔伯特·莫雷诺表示,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一直在推动建设欧盟货币政策的一体化与货币联盟,以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但这些机制要求一些主权国家将部分主权让渡给布鲁塞尔,事实上这样做难度很大,尤其是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低迷,加之政治动荡,使得欧盟一体化建设上加难。

肯尼斯·罗格夫认为,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改革是缺位的,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构改革的迹象,欧洲一些国家也没有。结构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需要更多层面的共识。瑞典之所以复苏的速度相当快,就是因为进行了大量结构性改革措施。

能源行业战略转变——

需求上升 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余惠敏

地缘政治、去碳化技术、气候政策、非传统的石油与天然气……谁是推动能源行业转变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嘉宾们济济一堂,畅谈能源行业的战略转变。

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利德·阿尔·法力赫认为,地缘政治对能源来说不是新鲜事物,中东仍然是能源的中心地带,而北美仍然是经济的主要地带。这两个地方对于全球能源的价格影响都很大。“未来20年大约需要4000万桶原油产能。但成本可能会非常高。因此,我们需要在每桶100美元的区间内,保持一个非常稳健的价格。”

他还透露,页岩气等非传统的碳氢化合物行业将有很大机遇和进展。“在北美,我们已极大地增加了气的使用量,已经占到发电量的50%,未来我们会把气的发电量从50%增加到70%,尽量多用气发电。这里有很大商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不同的行业。”他建议,为了降低化石燃料在整个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政策制定者应该为投资指明方向,无论是在供应链还是在人才等方面,都要有正确的政策指引。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首席财务官西蒙·亨利表示,地缘政治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影响到了石油的发展。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把成本降下来,以保障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

天合光能董事长、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高纪凡对未来太阳能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他说,太阳能的成本下降速度非常快,过去10年太阳能成本下降了五分之四。“大概到2020年或者2022年,太阳能的成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再下降一半。现在太阳能成本和天然气发电成本一致,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成本在沿海地区可降到5毛左右,跟煤电成本一致。大部分国家可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让太阳能成为重要的能源,解决很大一部分的能源自主问题。”



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延续疲软态势,发达经济体复苏艰难曲折,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回落。在“全球经济最新动态”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以及各国央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将为明年全球经济埋下隐患。

主要挑战仍是就业与增长

全球经济将延续何种增长态势?对此,与会嘉宾普遍持谨慎乐观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不同经济体发展周期步伐不一;发达经济体仍在努力走出衰退,美国一路领跑,而欧洲和日本尚未完全走出危机,新兴经济体已经走过经济增长周期的最高点。鉴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一年全球经济的主要挑战仍然是就业与增长。

8月份美国制造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延续扩张态势。尽管如此,哈佛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表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复苏基础更加坚实。但我们仍要谦虚谨慎,因为美联储每一



图1 与会人员在乘坐绿色电动车前往会场。
新华社发

图2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 牛瑾摄



图3 参会嘉宾在查阅论坛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 牛瑾摄



图4 与会嘉宾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禹洋摄

金融行业战略转变——

数字技术 推动发展

本报记者 杨涛

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下,金融行业的转型、创新和发展成为行业内普遍关注的话题。在“金融行业的战略转变”分论坛中,多位专家和企业家就重塑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模式、数字化产业升级等议题展开热议。

高盛印度公司首席执行官邦迪·博拉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电子化成为一种特质,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但他同时表示,技术的快速进步对于金融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金融监管不健全,不仅威胁金融本身,也很可能对经济环境造成破坏。

日本在线金融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松本大介介绍说,在日本,电子钱包非常方便,很多人不经常使用现金,很多商业活动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支付。这种移动支付技术,或者称为“数字钱包”在日本非常受欢迎。他表示,日本政府正在尝试让银行直接参与数字支付业务,数字支付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中的主流问题。

SWIFT亚太区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区首席执行官阿兰·雷伊斯也对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速度感到惊叹,智能手机的发展为移动支付功能的不断完善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同时认为,银行应该同专门从事移动支付的公司加强合作,以实现银行自身的附加值。他指出,对金融行业的适当监管对于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马恒达集团首席财务官帕萨拉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技术进步为金融行业带来的便捷性。他相信,未来金融行业将会出现电子化的革命,人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改变。



“创造性颠覆”论坛开始前20分钟,与会嘉宾已经排起了长队。
本报记者 牛瑾摄

新兴经济体将持续壮大

本报记者 禹洋

在10日下午举行的“新兴市场将再次崛起”分论坛上,与会代表各抒己见,就新兴经济体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激烈讨论。

新兴市场已经兴起

“30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28%上升至现在的50%,社会财富从22%增长到70%,贸易从21%发展到50%,投资从26%增长到65%,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群体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直言,新兴市场已经兴起,并将持续发展壮大。

新兴经济体走向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中,面临如何控制好经济软着陆的问题。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推行的超低利率政策,在缓解危机压力、刺激增长的同时,也给新兴市场带来了高通胀风险,政策缺乏平衡性。以美国

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例,其退出会对新兴经济体发展造成冲击。

对此,朱民强调,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存在周期性,新兴经济体目前正处在下行周期,所面临的挑战是不能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更加注重“人的发展”

会上,与会代表还就新兴经济体未来如何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更加注重“人的发展”进行了交流。“市场是创造不平等的,需要宏观政策配合市场机制,保证合理的分配。”朱民表示,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各国有不同的尝试。但有一点是相通的,要采取政策,鼓励贫富均等带来的经济增长。使用累进制征税,加大对贫困人口教育的投资等都是有效的途径。

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诸立力补充道,认识贫富差距,只看收入水平是远远不够的,收入的增长并不

一定能提升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不止要在收入分配上下功夫,更需要完善的社会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他建议,新兴经济体可以像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取经,鼓励企业和民众参与社会公益,发挥他们在资金方面的优势。

俄罗斯联邦副总理达瓦科维奇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新途径。以互联网科技、移动技术等较为成熟的科技发展为例,技术的普及让更多人享受到了快捷的信息服务。“现在,很多国家开通了网上便民服务平台,互联网的发展让更多民众享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与产品,这种转变并不直接来自于收入的提升,而是得益于技术的发展。”

携手合作共渡难关

目前,新兴经济体不断拓展地区间合作,相互补台意识也越来越强,中俄贸易、亚欧中小企业合作等新板块陆

续出现。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表明中俄、中非等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量在增加。”诸立力说,新兴经济体应再接再厉,拓展贸易伙伴,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类的组织。

诸立力还表示,合作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除了贸易领域,在科技创新、全球性挑战等领域,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国家,都亟需加强合作。“就拿眼下的埃博拉来说,病毒在不断蔓延,美国、英国、中国等国都在研发疫苗,如果各国能走出自身利益的小圈子,交流研发经验,新药研发的速度和质量都会好于现在。”

达瓦科维奇也认为,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考虑本国利益无可厚非。但如果各国政府看到的都只是自己国家的发展,整个国际环境将是负面的,难以达成协定和共识。政治家们要把眼光放长远,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使整个国际环境更加稳定,这也将有助于各国自身的发展。